

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

方法论导论

陈寿灿 编著

Overview of Methodology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

方法论导论

陈寿灿 编著

Overview of Methodology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陈寿灿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法论导论 / 陈寿灿编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8
(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

ISBN 978 - 7 - 81122 - 149 - 7

I. 方… II. 陈… III. 方法论 - 研究生 - 教材 IV. 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4583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0411) 84710523

营销部: (0411) 84710711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358 千字

印张: 17 3/4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东威 尹惠

责任校对: 田 晓

封面设计: 张智波

版式设计: 钟福建

ISBN 978 - 7 - 81122 - 149 - 7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方法论概述	1
第一节 方法与方法论	1
第二节 方法论的层次与要素	4
第三节 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7
第四节 学习方法论的意义	15
第二章 天人合一	17
第一节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17
第二节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30
第三章 中庸、无为、中道	38
第一节 儒家的中庸之道	38
第二节 道家的无为	48
第三节 佛家的中道观	53
第四章 直觉与顿悟	63
第一节 儒家的直觉思维	63
第二节 道家的直觉思维	66
第三节 佛家的直觉思维	71
第五章 由内而外的实践方式	75
第一节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	75
第二节 道家虚静通物的实践观	78
第三节 佛家即心成佛的修行观	81
第六章 本体论和本体论思维方式	83
第一节 本体和本体论	83
第二节 本体论思维方式及基本构架	86
第三节 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	95
第七章 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其方法论	110
第一节 近代西方认识论思维方式的确立	110
第二节 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归纳法	119
第三节 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理性演绎法	124
第八章 主体性思维方式和先验方法论	130
第一节 从“客体中心”到“主体中心”	130
第二节 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和“先验逻辑”方法	133
第三节 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先验辩证法	136
第九章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方法论	145
第一节 科学主义方法	145

第二节 向“人”的回归：人本主义方法	153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方法	164
第十章 从思辨逻辑走向生活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核心	169
第一节 从自我意识到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起点	169
第二节 从思辨抽象到现实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质	177
第三节 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归宿	185
第十一章 以实践为逻辑基点的新世界观	193
第一节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范畴	193
第二节 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及思维方法论	20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回应及其意义	207
第十二章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应用	213
第一节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213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221
第三节 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225
第四节 矛盾分析法	231
第十三章 科学发展观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应用与发展	235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235
第二节 对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自觉把握	246
第三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	255
第十四章 逻辑科学方法论	262
第一节 最基础的方法论	262
第二节 公理方法	267
第三节 能行性思维与非能行性思维	270
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76

第一章 方法论概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魏灵公》）方法历来被人们所重视，我国历史上治国有方的唐太宗曾有一句名言：“取法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帝范》卷四）这句话里包含着注重方法的选择和效法问题，即治国处事都应选取和效法高标准的上等方法。毛泽东对于方法的重要性有生动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方法论是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是方法应用的理论指导。学习和研究方法论要吸收中西方方法论历史发展的合理思想，也要从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加以不断提升。方法论的品格是与时俱进的，学习与研究它的目的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各项实践活动。

第一节 方法与方法论

一、方法

墨子在《天志》中说：“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这就是有名的“方法”与“圆法”，前者为度量方形之法，后者为度量圆形之法。据说这是汉语中“方法”一词的最早出处。“方法”后来演变成了做各类事情的办法或手段。

在英语中用“method”一词表示“方法”，根据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Third College Edition) 的解释，method 的含义为：（1）a way of doing anything; mode; procedure; process; esp., a regular, orderly, definite procedure or way of teaching, investigating, etc. （2）regularity and orderliness in action, thought or expression; system in doing things or handling ideas. （3）regular, orderly arrangement. 而 methodology 的含义为：（1）the science of method, or orderly arrangement; the branch of logic concer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to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inquiry; （2）pl. -gies a system of methods, as in any particular science. 方法是实践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桥梁和工具。

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从这个定义可以

^①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看出,它既包括认识方法、表达方法,也包括实践方法;它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一个分层次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思路(train of thought)、途径(channel)、方式(way)和程序(procedure)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形成了有秩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方法的内部结构系统。

科学研究的成就无一不与正确方法的运用相联系。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他还指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作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①当然,科学方法是方法的一个子类,因为并非所有的方法都能称之为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科学探索的工具。科学方法的两个主要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即逻辑结构和经验观察。科学方法一方面强调理论的构造;另一方面强调观察和实验。科学史证明,科学方法就是经验和理论的平衡,是两者的正确结合。

二、方法论

有一门学问叫方法学,是以方法或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论则是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人类创造和运用各种方法的经验,探求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方法论摆脱了具体工具的束缚,进入了思维领域,它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上升为抽象的理论系统。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它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指关于研究的方法、研究方式的学说;另一种是指在某一门科学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方式的学说。这两层含义都不是以具体的事物为对象,不可能解决任何以具体事物为对象的具体科学问题,只能对某一具体对象研究程序提供理论性指导。

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它所提供的是具体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规律或法则。方法论影响和制约方法的选择及其运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论的人考虑问题时都会有自己特有的观点和视角,同时在选择研究手段、程序和方法上也会表现出差异。

方法论具有导航作用,在科学探索中,每一种新的科学成果的发现,不仅需要科学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精密的实验,更需要有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方法论已经成为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等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同的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的习惯、风格和特点,不同的学派也各有研究方法的特色和传统,不同的学科更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研究,就是要从个别人、个别学派、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中,总结出关于方法的共同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是可能的,因为“个别之中存在着一般”。用过河需要桥或船的比喻来说,方法论并不为人们提供现成的桥或船,而是教给人们怎样认识造桥或造船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创造更好的桥或船的一般原则。这种一般性原则常常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提示、启发和指引,使人们根据具体情况寻找或创造具体的方

^① 袁运开、王顺义:《世界科技英才录——科学方法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

法,不再重走历史的弯路,更好地发挥创新精神,争取高效率地完成任务。这种提示、启发(或指引),正是方法论的价值所在。

三、方法和方法论的关系

方法与方法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方法是人们为了解决问题或者达到一定目的所使用的途径或手段。方法经过实践后上升为一种理论,而理论可以正确地指导实践,成为实践的准则,我们对任何科学领域的研究不仅要有可操作性的适当的方法,更需要方法论的指导,只有两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我们力图达到的理想彼岸。

方法论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简单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在研究、探索和阐释各种方法时,侧重于找出方法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的性质、特点、作用范围和局限,研究方法的发生、发展规律,讨论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究发现新方法和运用方法所应遵循的原则等等。应该说,方法论已经摆脱了具体的工具束缚层面,完全进入了人的思维领域,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上升为抽象的理论系统。

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它不是以具体的事物为对象,不可能解决任何以具体事物为对象的具体科学问题,只能对某一具体对象研究提供理论性指导。方法论是对方法诸方面的研究,在研究客观对象时,它又影响和制约方法的选择及其运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论的人考虑问题时都会有自己特有的观点和视角,同时在选择研究手段、程序和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异,得出的结果自然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它所提供的是具体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规律或法则。方法论具有导航作用,在科学探索中,每一种新的科学成果的发现,不仅需要科学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精密的实验,更需要有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方法论。

总之,方法和方法论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联系的角度讲,一方面,方法是方法论的片面的、散的、不系统的经验材料,缺乏方法论指导的方法是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具体的方法构成了方法论的基础和素材,没有具体方法支撑的方法论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可能指导人们对方法的运用、总结和提升。从区别的角度讲,一方面,方法论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堆积,而是众多具体方法的共性和升华,只有在一定的原理、观点指导下所形成的系统化、条理化的方法体系,才能称之为方法论;另一方面,方法仅是方法论研究的对象、加工的材料,是方法论中的个别和具体,不在一定原理、观点指导下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方法是不能称之为方法论的。

第二节 方法论的层次与要素

一、方法论的层次

我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进行分类,方法论便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按照方法作用范围的大小和普适性程度的高低,方法依次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1) 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如物理学中的光谱分析法、化学中的酸碱滴定法、电解法等。(2) 特殊方法。它是某一类学科中普适性程度较高的方法,如自然科学中的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反馈方法等。(3) 一般方法。它是在个别方法和特殊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来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根本方法,如实事求是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等。这三个层次大体上呈现着个别、特殊、普遍的关系。首先是比较具体的各专门学科的方法论或方法学,其次是概括自然科学一般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概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或概括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最后是从哲学认识论高度来论述的更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

按照人们认识过程的阶段性来划分,方法也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1) 感性方法。它主要是指获取经验事实材料的方法,如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等。(2) 理性方法。它主要是指对经验事实材料进行理论加工的方法,如科学归纳方法、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公理化方法等。(3) 创新性方法。它主要是指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探寻新视角等方法,如怀疑方法、直觉方法、外推方法、假说方法、悖论方法等。这三者大体呈现着人们认识事物的逐步深入的过程。

二、哲学方法论

依据上述两种方法的层次体系,我们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作如下规定:(1) 从方法划分的第一种层次体系来看,哲学方法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般方法,这种一般方法在方法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具有最高的普适性。同时也应当看到,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也具有高度的普适性,若将这些方法排除在一般方法论的视野之外,显然不利于哲学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2) 从方法划分的第二种层次体系来看,哲学方法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理性方法和创新性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也处于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因此它们也属于一般方法的范畴。

由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哲学方法论的内容就是研究处于方法层次体系最高层次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一般方法之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体系。在哲学方法论的学科体系中,既包括从哲学原理中直接引出的一般方法,也包括在特殊方法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一般方法;既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理性方法,也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创新性方法。因此,哲学方法论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从哲学原理中直接引出的一般方法。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相统一的方法等。第二,在特殊方法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一般方法。如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反馈方法,黑箱、灰箱和白箱方法,系统辨析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双向因果探寻方法,模型化方法,序列演化方法等。第三,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理性方法。如比较、分类和类比方法,归纳演绎方法,分析综合方法,抽象、具体及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假说方法等。第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创新性方法。如问题思维方法、怀疑方法、联想方法、直觉方法、灵感方法、外推方法、逆向思维方法、悖论方法、科学问题哲学解释方法等。

三、哲学方法论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哲学方法论首先被理解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方式、形式和体系的原理的学说。它要求阐明科学探索过程中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意义。这些要素包括:(1)客体,即主体所认识和变革的对象。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精神性对象,如思想文化等。客体有客观性、对象性、受动性、可知性、社会历史性和矛盾性等若干特性。(2)主体,即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具有客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主体有客观性,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具有社会历史性,是随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主体更重要的特性是主体性,亦即主体有主动认知、评价、变革客体的能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①只要条件许可,人有很大的以至极大的自由度,即是说,有自主性、主体性、创造性或者说主观能动性。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主体的多样性或多元性。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结合,构成人们的集体性、群体性。(3)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即基于社会实践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和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由于客体对象各具自身的特性,主体因自身的历史条件和基于社会实践的对客体的不同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具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处理事物的理念,所以具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形成了主体对客体的不同的评价方式、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论。

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互补与综合

论者一般把所有知识门类分成三大块,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般而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积淀是自然科学,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知识积淀是社会科学,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知识积淀是人文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属于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学和系统科学,从应用领域来说横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从研究方法上说一般把它们放在自然科学里。描述性的地理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和实验心理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精神文化事物的属于人文科学（学科），比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语言学、教育学等。介于这两大类之间的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还有一些跨门类的学科，如人文地理学、科学学、经济史学等。

从方法论上说，自然科学具有全人类的统一性，不仅每一门科学内部具有，而且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相互包容、协调、贯通，不会自相矛盾；它有公认的可操作的实验方法，其结果具有公认的可接受性标准即具有可证实性（可预言）或者可否定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以上这些方面并不那么精确。

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社会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和学科本身都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而演变发展，因此，既适合现代社会又适合古代社会，既适合中国又适合外国的学科和原理比较少。学习化学不必从炼金术学起，学习物理学、数学、生物学未必要学习物理学史、数学史等等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但学习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如果一点不懂该门学科的历史演变，就会显得很浅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二是统计性或模糊性。人文社会科学也有定量的研究，但更多的是定性的研究。由于对象在量的方面缺乏自然界那样的均一性和常住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与定性概念相应的对象领域的数量关系是统计性的。从样本中得到的数据只具有统计的意义，将之应用于某个对象域的时候，其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就更大了。在人文科学中，对概念的理解受到主体意识的干扰更多一些，其边界也就更加模糊。三是主体评价性。对自然科学中是非的评价有许多客观标准可循，在社会科学尤其在人文科学中，充满着对客体的主体性评价，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普遍现象。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也有共性。比如都使用观察、比较和假说，都使用直觉、想象和推理等等。对任何学科、任何理论来说，实践总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实践验证理论的过程同样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又是互补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钱学森就自称他的科学创新能力得益于少儿时代培养起来的对音乐和艺术的爱好。文理相通，绝非偶然现象，其根据就在于认识论上的一条原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自然科学成果改变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在内的整个人类的背景知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解决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通力合作。技术发明越来越体现人本主义和人性化的理念。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早就被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方法所充斥。最明显不过的是横向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论、自组织论等等，它们的适用范围横跨多个学科，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类社会，故称横向科学。系统科学虽然是以有机体、信息系统、自动化系统等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数

学理论,但这门新兴学科群所提出的一些范畴具有世界观性质。系统(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有序与无序等等关系已经升华成为哲学范畴。系统科学能解释从星系演化到生命演化,从自然界到社会组织,从气象变化到复杂的人工系统等一系列自组织现象,它所提供的方法已经在工程技术上有重大的应用,因此系统科学方法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方法论意义。

总而言之,每一门学科的方法论永远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同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在方法论上的互补和综合又是大势所趋。法国作家福楼拜在19世纪就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瑞士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如果说有一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那么,也有一股相反的倾向,即某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化。”^①从哲学方法论来讲,马克思主义对正确认识方法论的综合化趋势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概括了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个领域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因此具有最广泛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新理论的建构,作为当下的现实课题,是对传统方法论价值的挑战,也是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机遇。

第三节 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一、西方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是西方世界思维方式的传统和特色之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写过6篇逻辑学著作,其后学者将其编辑为《工具论》,为后来整个演绎逻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近代,培根又开创了归纳逻辑的研究,其著作取名为《新工具论》。笛卡尔把数学讲究假设和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引入认识论,开创了理性主义方法论的传统,其著作名为《方法谈》。康德推出先验主义方法论,开创了主体性思维方式的研究。黑格尔是研究唯心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方法论研究。之后,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方法论,迦达默尔发展了诠释学方法论,维纳等开创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等等。自古至今,我们一直受惠于哲人们的金手指的指点。

西方方法论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古代本体论思维方式、近代认识论思维方式和近现代主体论思维方式的演进。

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开始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对于“始基”的探究。所谓始基者,即万物由之产生、由之构成、千变万化中又复归于它自身的那个东西。泰

^① [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5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勒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其他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是土、“不定者”、“努斯”、“火”、“原子”等等。原子论哲学的猜测成为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分子—原子假说的先导,充分展示了哲学方法的永恒魅力。但是原子作为万物始基的实体,毕竟难以解释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难以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也不合乎宗教信仰的需要。于是实体论的思维方式让位于存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是研究存在论思维方式的集大成者。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哲学认为唯有上帝才是终极实体或终极本体,存在本体论思维方式由此转化为关于上帝的存在论思维方式。

到了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应运而生。以培根、洛克、贝克莱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取向,代表了两种各不相让又相辅相成的方法论倾向。科学认识之目的是建构科学理论,但理性认识只能以感性经验为源头活水,而从科学实验中得来的感性经验若不上升到科学理论,则无法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洞察自然的奥秘,缺乏普遍意义。有鉴于此,哲理上有必要打通经验论和理性论各自的局限性。从反面反思认识方法论教训的有英国的休谟,他采取的立场是正话反说的怀疑论。从正面总结和综合认识方法论教训的是德国的康德,他采取的立场是先验主义。黑格尔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哲学史和认识史来了个大综合。

康德在总结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者片面性教训的同时也开创了主体论思维方式的研究,实现了认识方法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主体为中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我们剥除其先验主义倾向,就可以看出他的“先验逻辑”方法的目标是为自然科学“普遍必然性知识”确立形上的基础,同时为宗教留下自身的地盘。在康德之后,认识方法论的主体性倾向愈见充分和丰富。黑格尔包罗万象的主体辩证法体系展现了一幅主体性愈来愈强的画面,从存在到精神,从生物感知性到人的理论精神、实践精神和自由精神,从道德、伦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从艺术、宗教到哲学,无一不是主体性的演进。

与黑格尔同时代,甚至在此之前就开始流行起来的欧洲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及其方法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英美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分析哲学思潮,都具有主体性思维方式的特征。功利主义强调主体的功利性,实用主义强调对于主体来说的实际效果,胡塞尔的现象学标榜“回到事物本身”,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存在先于本质,诠释学提出主体对文本和客观世界的理解是世界的存在方式等等,这些哲学思潮无不凸显着主体性的高扬。

分析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掀起了一股持久的“语言学转向”。有的分析哲学家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伪命题。有的分析哲学家通过语言分析得出了不能排斥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结论,但整个分析哲学从总体上来说总是在主体的语言框架里做学问,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哲学问题、词语的意义问题作概念分析、命题分析、语言分析

和逻辑分析,始终秉持一种语言符号学性质的主体性。

二、中国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的认识方法论,所侧重的也是本体论即存在论思维方式。《管子·水地》篇以水为本。《老子》以道为本。东汉王充则明确地以元气为本。以物为本的对立面则是以作为精神之天、意志之天和道德之天的天帝为本的本体论。

中国古代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思维方式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于观照整体的辩证法的探讨,二是注重于人生伦理问题的探讨,后者的特色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辩证法思维源远流长。八卦由阴阳二爻构成,而古书上说八卦是伏羲氏所创。虽是传说,但起源甚早是无疑的。《易经》以形象的语言宣示了辩证法能指导一切人事的活动。以阴阳的相反相成关系解释和指导战争、医疗、农事等一切社会人事的现象,解释万事万物的产生、构成和灭亡。《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丰富了道的内在结构,又明确了道与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儒、道、法各家都强调大化流行、生生不息这一普遍法则。儒家肯定汤武革命。《礼记》有《礼运》篇,“礼运”意即礼是运动变化、与时俱进的。《易经》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它的《系辞传》强调变易的永恒和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通其变……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不可远(离),为道也屡迁(变),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定则),唯变所适”。法家商鞅强调“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演进的社会进步观,“事因(顺应)于世,而备(设施)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至于“五行”思想这种本体论,也强调万物相生相克的辩证法则。

阴阳、五行思想都失之过于朴素、直观,于是有和同之论与两一之论予以弥补和矫正。《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公元前774年)史伯对郑桓公论和与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期晏婴也论述过和与同。孔子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料,提出“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和而不同”不仅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处理不同文明体系,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根本方法,更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准则。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论即人生理想论,而人生理想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孔子的仁,墨子的兼,其本来的表现形态确实有时代性,而我我之和諧是永远应注重的。”^①

两一论即对立统一论。它能涵盖和解释阴阳论涵盖和解释不了的问题。《老子》提到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祸福、荣辱、刚柔、强弱、巧拙等等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5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有几十对之多。“反者道之动”正是老子对现象界普遍存在的辩证法则的深刻总结。宋儒对两一法则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集》）。“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朱子语类》）。“惟道为无对，然以形而上下论之，则亦未尝不有对也”（《近思录》），“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清初王夫子在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天高地卑，其界不可得而剖也”（《周易外传》）。阴阳没有绝对的门槛，刚柔没有绝对的畛域，老少没有绝对的时刻分割，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峙者，是人们从理性上划分的结果。

和同论与两一论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认为，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最终解决方法是和，而不是斗争到底。张载的四句话最典型地表达了以和为贵的解决矛盾之道，“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相对于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不那么注重分析和实证科学。除了数学、天文学和医药比较发达外，其他实证科学均缺乏分化。诸子百家的著作，均是小百科式的，长于系统的、整体的、战略性的辩证思维而拙于分科知识的研究；长于技术改进，拙于科学体系的构思等等。

古代中国哲人对于人生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本于“天人合一”的概念框架。

天人合一思维形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宗教式的天人合一论之外，哲理上的天人合一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天人相类论；一种是天人相通论。天人相类论的代表为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人生有喜怒哀乐之欲，春夏秋冬之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股，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其论带有宗教目的论性质，牵强附会，没有方法论意义可言。

天人相通思想的源头甚早。凡遇家族和军国大事，古人总要祈祷上天保佑。《尚书（晚书）·泰誓》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理论上论证天人相通的，则首推孟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能扩充人心本有的仁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会知道人性本善；知道了人的本性，就会知道人性是受之于天的。孟子虽然主张人心本于道德之天，甚至主张“莫非命也”，一切来自于命运之天，人所以要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目的就是“事天”，对天尽义务。但是他并不主张宿命论，相反，却从中得出主体性的结论：人应当“顺受其正”，按照天命而生而死，“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尽力行道而死，属于“正命”；违法受刑而死，属于“非正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勉励按照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达到仁德之路没有比由自身做起更直接的了。

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体道”或“悟道”，以天人合一、物我一

体、万物与我为一为最大快乐，以体认天道、实践天道为最高境界。

同是儒家学派，也有主张天人相分、天人相胜的。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有常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明于天人之分”，才称得上是圣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叫做“能参”，即天地人相互配合，“万物各得其和”。他的结论是：“制天命而用之”，“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唐朝的刘禹锡主张天与人各有所能所不能，“天与人交相胜”（刘禹锡《天论》）。

在着重探讨本体论和人生论问题的同时，中国哲人也探讨“致知”之方以及“闻道”之方或“为学”之方。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认识论，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方法论。在近代之前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不发达。因此这两部分理论也都不免过于简略，但仍然不乏具有永恒价值的睿思。强调致知和社会实践、致知和道德修养的统一，强调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的统一，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特色。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创立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简单的认识论体系。孔子并没有列举谁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人，孔子悬生知而重闻见。^①墨子、孟子、荀子、老庄和韩非子，以及两汉、六朝、唐、宋、明、清，儒、道、释各家均有各自的致知论和为学之方，以下仅选择其最有特色的部分作一概述。

《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一切）皆以修身为本”，知本才算“止于（达到）至善”的境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举措得当，有效果）”。“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接着，《大学》列举了著名的“八目”，即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格物致知的格物，古人有各种解释。朱熹解释为“即物穷理”。明末清初的颜元把格字解释为“手格猛兽之格”，所谓“格物而后致知”即“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即是说通过实践而后获得知识。这样看来，《大学》提倡的“八目”功夫，是融认知、道德修养和实践为一体的方法论程序。

《中庸》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笃行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张，科学方法以“问题”为开端，但是如果不以适当广博的知识（包括经验知识）为基础，怎么能提出中肯的科学问题呢？足见《中庸》所概括的知行融为一体的五步方法论程序确有其高明之处。

古代中国还有众多思想家使用直觉性思维方式，在知行方法论方面使用了大量主体性思维方式，本书对这些多有讨论，兹不赘述。

近代以降，中国人探索富民强国之路，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创

① 张岱年：《孔子哲学解析》，见《张岱年全集》，第5卷，34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制的几乎全部认识方法论，包括传统的方法论。其中有几点最可注意：

(1) 进化论，即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在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今译名《进化与论理》）之前进化论便盛行一时，进化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变革中国的思想武器，但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的实际上是庸俗进化论。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样把进化论当作思想武器。

(2) 古为今用。洋务派的张之洞倡导“中体西用”论，企图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保存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之体。严复反驳说，体用不可分割。“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不过从主体论的角度上说，“古今中外”之法，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为主体所用的。康有为、谭嗣同则充分发挥了“六经注我”法。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提出了著名的“托古改制”论，企图以此改良清朝政治体系。谭嗣同所写的《仁学》以“仁一通一平等”为普遍规律，他论证这条根本规律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此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号召人们“冲决网罗”。

(3) 机械唯物主义。“以太”论是近代学者的本体论武器，比如谭嗣同就说，“夫仁，以太之用”（《仁学》）。“阴电阳电”，“细胞”也是他们经常提及的名词。

(4) 逻辑方法。严复引用培根思想，强调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他先后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的《名学》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孙中山则建议把逻辑学译为“理则”学，对逻辑法推崇备至。

(5) 张扬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大革命家孙中山推崇精神作用，甚至到了近似于二元论的地步：“生元（细胞）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者，心之器也”，“心也者，成事之本源也”。（《孙文学说》）他从革命党以弱胜强的经验中总结出精神的能动作用，“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军人精神教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哲学进入现代化过程，涌现出一批阐释现代哲学论题，构建独立哲学体系的哲学家。由于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以及如何现代化的诉求不同，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观也不同，因而其哲学方法也各不相同。倾向于接受西方哲学观念的喜欢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强调方法的重要性；以中国哲学为本位的，喜欢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方法讲中国哲学，不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其结果是，用西方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确实使中国哲学更具有现代性，但是否讲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则是另一回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用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讲中国哲学，而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则表明他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胡适开创了用“科学方法”讲中国哲学的先河。

金岳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用西方的认识论方法建立了中国的“知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哲学关系不